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局面 及其政策选择*

析 林

【提 要】小康社会看似貌不惊人,却将中国从一个与佛得角相提并论的低收入国家带到了类似于黑山共和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再乘以十三亿多人口,总量更是无比巨大。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已悄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总量上超英赶美实属不易,而防止(防治)两极分化更难,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是现代化的一道坎,历史上、现实中掉入这个陷阱的国家不计其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当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要区分几种不同情形,笼统地斥之为两极分化等于废除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防止(防治)两极分化要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小康社会 中等收入陷阱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6)04-0005-07

邓小平提出建设小康社会“三步走”战略,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事业,几代领导人前赴后继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开拓、发展壮大这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①现在到了“收关(官)”阶段的最后5年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1987年又提出实现小康社会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 thousand 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党的十三大以后,这一战略构想就成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任务;十六大提出在新世纪头二十年即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后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发展目标时间跨度长达50年,延伸到了21世纪中叶。党的十六大至十八大报告的标题都彰显了小康社会这一主题。

* 此论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创新工程项目“国家治理观的历史演进”(2014mgchq022)、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创新工程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MYYCX201404)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12AKS001)的阶段性成果。

① 邓小平不仅描绘了小康社会的蓝图,还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跨世纪发展的“三步走”战略构想。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率先提出“小康”概念以及到二十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的构想。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小康之家’。”(《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页)“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

(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许多机构预测,届时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一个新的世纪即将到来,就如同1872年美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开创了“美国世纪”一样。距离冲刺所剩时间不多,未来五年(正好是“十三五”时期)是关键,这就有如接力赛,无论前几程的接力棒有多重要,最后一棒都是致胜环节。所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除了要有正常的建设速度保质保量完成之外,还要对前期查漏补缺,完善各项制度。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经济总量达到或接近全球第一

邓小平当年很睿智地讲,我们的现代化不要贪大贪功,能够实现小康社会就很了不起,这是很有见地的。

第一,虽然从人均水平上只有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乘以十三亿多人口,总量规模无比巨大。

从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源占有量、消费量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是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有些人均资源占有量、消费量指标甚至还达不到。这对于刚刚摆脱贫困、越过温饱线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喜从天降的大礼包,但以今天的眼光看,就没有太大吸引力,不能夺人眼球,很多城市家庭都远远超过了这个水平。

但是,人均水平乘以十三亿多的人口数量,其总量规模不得了,已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体量。也就是说,即便建成的只是小康社会,一个巨人已经悄然屹立在了世界的东方。它于中国、于世界都有非凡的意义。对中国来说,这是百年来未见的世纪大逆转,由一个积贫积弱走向穷途末路的国家向世界强国跃进。对中国来说,这是在向正常的发展路径(常态)回归,^①但对世界来讲意义就非同小可。从“中国制造”到G20、再到G2、再到AIIB(亚投行),再到人民币进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国走向世界的脚步越来越快,^②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今世界的格局,不仅中国离不开世界,世

界从此也离不开中国。

第二,将小康社会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头一次,丰富了小康社会的内涵和精神实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小康的目标有确定的边界,《大学》中讲“知止而后有定”,正因为知道边界在哪里,才会有恒心和定力。把小康社会绑在现代化的车轮上,这就赋予小康社会以现代意识,它就不再是静止的、消极的。一方面,只有建立在开源节流、量入为出的基础上的现代化(即小康社会)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土豪式挥霍和浪费、挥金如土是可耻的,也是不可取的。尤其是水资源利用、环境治理,对于十三亿多人口来说始终是现代化进程当中越来越紧的瓶颈和硬约束。另一个方面,一个现代化的小康社会才是有保证的。小康社会不是撞大运或天上掉馅饼得来的,而是整个社会有序、有效运行的结果,必须要有制度规范和制度保障。现代化的“止”和“定”就在这里。如果只是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生活略有富余,那不叫现代化;现代化必须是生活在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制度中,具有现代思维理念和行为方式。

可见,我们所讲的小康社会,骨子里是现代化的,现代化的载体是小康社会,这就极大地丰富了现代化的血肉。是否达到小康社会不仅要有总量指标(尽管它是先行指标)和人均指标,还要看是否建成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以及它的治理效果和治理能力怎样。

二、收入分配结构企稳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加重要

在总量、人均水平之外,还要看结构。一

① 据称,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在被问到如何看英国GDP被中国赶上时说:“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这样一个国家的经济上升,并且超越人口只有6000万的英国,我们不应感到奇怪。”转引自2012年3月5日《环球时报》文章:《美媒例数哪些领域“败北” 专家认为中国以量取胜》,或参见<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2-03/2497379.html>。

② “超英赶美”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一五”计划期间)提出的,当时仅限于粗钢产量,未涉及经济总量,更谈不上全面赶超。

家小康并不难，难的是家家户户都达到小康水平，这样，整体实力就很强了。譬如，两个国家同样都达到小康水平，总量和人均指标大致相当，但结构不同，稳定性大不一样。结构匀称的小康社会，其稳定性就好，抗风险能力强；两极分化的小康社会，其稳定性就差，起于纷争、终于内乱，穷于应付，自顾不暇，哪来发展后劲？

从统计特征来讲，均值和中值高度吻合，没有两极分化，这个时候系统（性能）最稳定。相反，内部两极分化，系统就不稳定。衡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社会）除了总量指标、人均指标外，还要有结构指标，方能反映它的全面性、稳定性。如基尼系数、中等收入群体占比，都是反映小康社会结构特征的重要指标。

一般来讲，纺锤型收入分配结构具有稳定性，当快速发展、变道超车时能承受得住压力，而哑铃型（或称沙漏型）收入分配结构就不能承受同样的压力，在拐弯时难免会出乱子或是中途翻车，由纷争导致失序、由失控导致内乱直至内战。当然，如果纺锤型收入分配结构指的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这种一刀切的统配盘子则又另当别论。

小康社会是否稳定、是否可持续，关键在于结构是否稳定，是否惠及大多数人。只有多数人都达到小康而不是只有少数人富有、多数人贫穷，那才是高质量的小康社会。

贫富差距越大，贫富分化越严重，弱势群体越多，社会越不稳定。光顾总量快速发展而不顾结构恶化，迟早要翻车。历史上很多国家都没有摆脱这种厄运，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拉美掉到“中等收入陷阱”泥潭而不能自拔——不是因为没发展，而是快速发展时出现了阶级分化，裂痕难以弥合，最后整个社会被撕裂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一度发展很快，但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分配不均、贪污腐化、通货膨胀和两极分化，结果是内讧不断，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如果追溯得更早些，资本主义兴替、封建王朝倒台大都与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有联系。

只有中间收入者占多数的小康社会才是最稳定的、高质量的小康社会，是安全、幸福的小康社会——其幸福感来源于和谐的、健康的（量入为出、适可而止的小康社会）、乐观的人际关系（乐观是因为自信和对未来充满希望）。

总量指标、人均指标气势恢宏，并不代表脚底下没有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这么出来的。两极分化的小康社会的总量指标、人均指标也很体面，但它是两极分化的（沙漏型收入分配结构），由此导致内部关系紧张、撕裂，出现鸿沟。即便有着很高的收入，但如果彼此情绪对立，生活在仇视和敌视或者恐惧的氛围中，不可能会有幸福感。两极越分化，内部越容易撕裂，整个社会不得安宁，不断会有各式各样矛盾和斗争爆发。争资源、争利益、争福利，造成连锁反应，乃至内乱。

三、总量指标、人均指标和结构指标密不可分

割裂总量（或人均）与结构关系，就无法给予综合的评价，也不能及时测评风险。总量要靠结构来支撑，要达到什么样的总量目标（结果），就要有相应的结构支撑，否则难以持久。竹架子只能搭茅草房而建不了高楼。总量和结构密不可分，二者形影相伴，骨肉相连（结构是骨，总量是肉）。有什么样的总量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构；同样，有什么样的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总量，共同构成活的有机体（即生产方式）。

总量如何发展壮大，跟结构密切相关，二者相互匹配。什么样的结构能够支撑得住多大总量，能够发展成多大体量，能持续多长时间，都是有讲究的，这是一种生产方式而不是彼此分离的两种生产方式的拼接。譬如，碳排放是跟传统增长方式相伴而生的，要总量增长就得忍受雾霾，要减少和消除雾霾就得壮士断腕，摒弃传统增长方式、限产减员，总之不能两头都占而不付出代价。

为了更好地说明现实中的总量与结构的关系，总量是如何快速增长的，结构是如何两极

分化(畸形化)的,需要区分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增量改革。

倘若要素投入不求回报,还有人愿意投入吗?倘若收入分配不拉开差距,能有生产积极性并增加产出吗?1975年第一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正处在批“唯生产力论”、批“资产阶级法权”这样的大环境中,但是,主抓经济工作就不能不针锋相对地提出两个尖锐问题,一是生产到底要不要抓,二是抓生产究竟以什么为动力,多劳多得有什么错?^①要想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最终只能是除良存劣,社会退化。“大锅饭”之所以走到穷途末路,是因为它导致逆向选择、坐吃山空,所有人都向贫穷看齐。所以,“一大二公”体制迟早得改,这出戏没法长期唱下去。

改革首先就是要拉开收入分配差距,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并不意味着收入分配结构恶化,相反地,它优化了收入分配结构,提高了收入分配的质量,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源泉。回过头来看,“大锅饭”是让收入均等化了,但那是低水平的收入均等,连温饱都不能满足,除了特权者会心存幻想之外,谁还会死抱着不放呢?

最初的改革触及不到旧体制的核心利益,一部分最先富起来的人群也只是活跃在旧体制的边缘、外围,存量部分没有动,旧的利益分配格局并没有被打破。只是放宽了尺度、解除了禁令,不再把小商贩按“投机倒把罪”法办了,没有对国有工商业造成直接冲击。

国有工商业和早集晚市之间没有交集,不构成直接利害冲突关系,而是互相补充,共同繁荣市场供给的花色品种,增加了消费选择性,因而使得社会整体福利明显改善。

如果是在不妨碍其他人利益的条件下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是对收入分配结构的极大优化,激励了投入和产出,因而拉开收入分配档次和差距是合理的,不能看作是扭曲的、畸形的。然而事实上并非全然如此。国有工商业是否真的毫发无损,进而所有人的利益都不受损呢?显然不是。只要允许非公经济发展,就会损害到国有垄断利益格局,这是讲的销售

市场;而从原料供应上看,非公经济最初不占任何资源,得从国有部门分得一杯羹,这就滋生了两种体制下“倒爷”、“黄牛”等的权力寻租现象。没有利益输送,也就不会有资源倒流。

所以,不能笼统地讲拉开收入分配差距就是两极分化的表现。

第二种情形:外向型经济。

作为边际改革的一种,它走得更远,因为它的回旋余地更大。先是有四个特定开放城市,然后是沿海开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再是沿边开放、沿江开放(九十年代),最后是加入WTO,形成全面开放的经济格局(仅指贸易领域而非金融领域)。

最初的外向型经济只是为了弥补财政投入不足和创汇能力不足的“双缺口”,引进外资既不需要增加财政投资也不跟国内市场发生冲突(供销两头朝外),还能够增加就业、增加税收,拉动产值(GDP),因此是一个内外双方合力共赢的格局。

引进外资被看成是一本万利、坐地分成的好事。初建开发区搞“四通一平”只是为了筑巢引凤,以满足外商投资对软硬环境的特殊要求,把它当作特事特办,意外地又有两大获益,一是规模效益,集中开发连片工业园区,上中下游产业相对集中、互相衔接,能极大地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二是通过土地置换,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和土地价值。因此分税制之后“土地财政”率成了地方财政的命根子,这是推动城镇化最重要的一股强大势力。这个时候,开发区热和城镇化热两股热潮汇流一处,房地产开发就成了推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外向型经济这种态势和格局对于收入分配结构会产生何种影响呢?

外向型经济也是一种增量改革,不管与它对接的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选择绕道而行,不触及原有的体制机制,因而收入分配结构总体上是改善的,虽然收入分配差距拉开了,但它是良性的,不会严重恶化,社会整体

^① 参见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福利和个体福利都提高了。

可以说，外向型经济开辟了改革开放的广阔空间。最显著的指标就是产出和就业。同时，外向型经济也比一般的边际改革带来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这个统计特征也是非常显著的。原因就在于它丝毫不受国内需求的牵制和约束，只跟随国际市场行情波动，而国内在“农转非”完成之前劳动力永远处于某个不变的价格（潜在的失业人口过多、供给过剩因而呈现无限供给的态势），这就使得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两极分化趋势。这个阶段也是收入差距拉大比较显著的阶段。

能否据此判断收入分配结构恶化和两极分化呢？恐怕不宜过早下此结论。我们看到，在完成了“农转非”出现“民工荒”和工资成本上涨之后（此现象发生在2005年前后，而世界银行预测是在1995年），产业转移、产业转型、产业升级势所必然，两极分化现象相对缩小。另外，城市化进入新阶段之后，必然更加重视分配和消费，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所以，应该肯定收入分配结构变化仍然是改善型、收敛型的，尽管它还不是分享型的。可以判断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良性的而不是恶性的，不会无限拉大或加剧，它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会自动收缩，不至于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先期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农民工被大量吸收，当出现“民工荒”之后进入拐点，工资水平开始上涨，前期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告一段落。可见其收入分配结构是呈倒U型变化的，而且是自动实现的，不存在系统性风险。据此，可以认为开放不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升级，市场自我调整的能力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

当然，如果整个世界出现经济危机，就有可能引发突变，导致系统性风险。如果外需锐减，整个外向型经济就会掉转头向原本就很紧张的内需挤压，因而过去那套避重就轻、舍近求远的战略就失控了，加剧并恶化国内矛盾。最典型例子是十九世纪末的德国，俾斯麦新政制造了一个强大帝国，但是碰到世界性经济危机，国内的利益格局又动不了，矛盾就激化了，这个时候喜剧就反转成了悲剧。

第三种情形：存量改革。

前两种情形只涉及增量部分，没有触及旧体制的核心利益，关键在于存量部分如何改革。这才是大头。最大的存量不外乎资本、土地，还有在职（岗）员工。^①

财产性收入分配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更大，很难逆转甚至不可逆，因而具有马太效应。存量资本改革有三个关节点有可能恶化收入分配结构：

一是在招股认股环节个人侵吞国有资产，将股份划入个人名下，那么股份化就会恶化收入分配结构。

二是内部人收购（MBO）。俄罗斯私有化只是第一步，最后它被内部人收购，由此少数人一夜暴富，而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准下降，从而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极少数财富帝国像一座座孤岛处在失望人群的汪洋大海之中。

三是全流通。股权分置（非流通）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全流通之后如果制止不了内幕交易，股价完全掌握在操盘手中更难控制，这不是一夜暴富而是一次键盘回车0.01秒就能搞定的事情，两极分化就更加惨烈。

围绕土地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土地问题跟城市密切相关的是住房，每个人都得有栖身之地。城市化进程其实也就是房价、地价攀涨的历史，这是历史规律，只能说明城市的效率和效益所在。当然，城市化也有生命周期，房价就是城市化的温度表。什么时候城市化进程中止了，房价地价也就涨到头了。比如底特律，过去是汽车城，城市扩张规模与房价涨势同步，现在城市产业空心化，房价一落千丈。

财产性的两极分化更甚于收入性的两极分化，有些人从中获得了经营性收入，如租金、房价增溢、地价增溢，而另一些家庭则是常备开支，需要支付购房首付款、月供、年租金或半年租金，这一进一出是产生新的两极分化的

^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通过关停并转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消化了一部分国企在职（岗）员工，余下未决的是这部分员工的养老金挂账问题，如何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能不能用国企资产补缺？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收入分配结构变动及其趋势。

最大源头。更要命的是，房价涨幅比工资涨幅还快，资产价格起到了二次分配的功能，拉大收入分配差距。如果一个人现在买不起房，也意味着将来买不起房，收入的增长永远跟不上房价的涨幅，这就将新城市人（包括外地人、年轻人）拒之门外，新的城乡差别、代际差别由此产生。如果既是外地人又是年轻人（外地年轻人）那就只能成为城市中的蚁族，城市中高楼林立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一边是飞涨的房价和租金，另一边是扎堆的蚁居，会有什么后果？必然滋生仇富心理和街头暴力。

第四种情形：如何让中间层大多数人富裕起来。

上述三种情形实际上也是我们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所以，不能笼统地讲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就是好或就是坏，理应区别对待。

第一种情形，增量改革的结果，适当地拉开了收入分配差距，显然是利大于弊，改革由此起步；第二种情形，外向型经济的结果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但不至于严重恶化，但是系统性风险也在积聚增长；第三种情形，存量改革的结果是收入分配结构有可能恶化，才是需要密切关注和重视的。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就要着手解决共富问题。发展起来之后是“共享”，即让大多数人有机会。如果只有“前两步”，只是释放出了少数人的生产力，后续的增长动力要靠大多数人创造，才能弥补因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换档期出现的真空。如果还是旧有的发展方式，无法胜任这一根本性转变。因此，贫困状态和富裕之后的发展起点不同，发展理念也要改变，必须因地制宜，与时俱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包括人均、总量、结构三大指标。由“先富”到“共享”，实现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寓意所在。如果仅是人均和总量达标，同时出现两极分化，那我们改革开放的事业就失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性就体现在这里。“共享”不是去两头留中间，而是要设法让中间大多数人赢得发展的机会，这才是最大的共享。但凡能够很好解决中间层动力机制的中等收入

国家，都能够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大踏步地迈向发达国家。反过来，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就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当然，如果不发生国际金融危机，旧的发展方式还能苟延残喘多时。但是，如果国际上发生了金融危机而国内又不能解决两极分化，此时，并发症就会出现，那就相当危险了。拉美问题、中东危机都出现在这个断裂带上。

制止两极分化有两种极端办法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它们是极度短视的行为，只顾眼前不顾长远，毁灭培育持续发展的后劲。一是削足适履，全面限制和控制收入分配，结果是投入和产出全面萎缩，人才、技术、资本外流；二是纵容、包庇、袒护既得利益者，高通胀是常规手段，甚至不惜动用武力维护，幕后藏污纳垢腐败不堪，国家沦为马基雅维里式的利维坦，谁也不会有安全感、幸福感。

如果说建设小康社会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那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为了解决合力和共同富裕问题。形成合力和共同富裕不能拆开来，共同富裕不是打秋风，劫富济贫，而是要形成合理的共同的激励相容机制，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如果此时我们因噎废食，就很容易得出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这种草率的结论。

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显然，转型期面临新挑战，因此改革也要进入新常态，应对这种挑战，才能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人极端地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命题，无视两极分化倾向，最后就把小矛盾拖大、大矛盾拖炸。积极的应对策略是：

第一，经济紧缩是实现新常态的必要条件。经济繁荣、快速增长时期是不可能调整结构的，只会助长原有经济结构更加畸形。经济下滑肯定不利于就业，影响社会稳定，但有利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得最好、市场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时期恰是经济紧缩时期。

第二，经济紧缩的同时要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真正的市场都是在经济高潮退去、政府撒手时作为补充、回填、补缺的角色进入的，反而夯实了市场基础。事后证实，其后续成长性非常好，抗风险能力很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有一个宏大的设想，就是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形成更加蔚为壮观的合力（生产力）。所谓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用意分明凸显在这里。

第三，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必须全面依法治国。市场是由预期指导下的选择行为构成的，反映行为主体的意志，倘若没有定法、没有规则，那么预期无从产生，就不可能有资源、要素解囊相助、纷纷投入，相形之下，单一主体、单一渠道的投入是不可能让市场兴旺的。所谓法治社会，不是要强制规范人们依法守法的行为，而是为了产生稳定的预期，导致行为的连续性和持续性，这是法治社会的一大功效。

讲法治，仍以生产力为检验标准。同时，讲法治一定要讲真正的法治，不能倒果为因，只讲手段而背离了根本。否则法治就成了外生的强制，不是来源于内生的需要，即不是产生于市场行为（者）自身（内在的）需要。

第四，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不仅意味着工作重心的转移，也意味着领导方式的改变，有了前述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两个方面的规范，从严治党也就有了准绳。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以前所未有的高压态势治理腐败。要想做官就别想着个人发财，政商关系泾渭分明，切断权贵资本的连襟，从而强化了党内依纪依规办事办案和依法治国的效力。如果还是旧有的发展方式，责权利的界线势必难以清晰划定，全面从严治党也就无从谈起。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创新工程项目首席研究员
责任编辑：周勤勤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olicy Choice for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Comprehensively

Hang Lin

Abstract: Although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seems unremarkable, it has been making remarkable progress for China to grow from a low-income country like Cape Verde up into a middle-income country like the Republic of Montenegro. The total amount of GDP multiplied by 1.3 billion population is so huge that an economic “growth pole” has been seemingly standing in the east of the world. Catching up with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otal amount of GDP is not easy, and it’s harder to prevent (cure) the polarization of income, which is a hurdle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from letting some people get rich first to reach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lots of countries fell into such a trap in both history and reality. The middle-income trap has to be overcome in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And of course we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the expanding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Otherwise, market economy will be abolished if we rebuff it as polarization. It depends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its capacity to prevent (control) polarization.

Keywords: a well-off society; the middle-income trap; modernization